

乱世

THE FIGHT FOR
THE REPUBLIC IN CHINA

〔英〕帕特南·威尔 (Putnam Weale) 著
秦传安 译

袁世凱

不可否认，我们的确生活在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代。
这是一个让我们最珍贵的原则成为废纸的时代。

——帕特南·威尔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乱世

袁世凱

〔英〕帕特南·威尔 (Putnam Weale) 著
秦传安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乱世袁世凯 / (英) 威尔著; 秦传安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5117-2145-7

I. ①乱…

II. ①威… ②秦…

III. ①袁世凯(1859~1916) — 生平事迹

IV. ① 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85436 号

乱世袁世凯

出版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董巍

责任编辑: 曲建文

责任印制: 尹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座(100044)

电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70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5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网址: www.cctpbook.com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数: 226千字

印张: 18.75

版次: 2014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 68.00元

网 址: 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ID:cctphome)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66509618



译者前言

套用唐德刚教授关于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历史三峡”理论，清末民初这数十年，应该算是一段滩险浪急的艰难航程了。武昌起义的一声枪响，千年帝国眨眼间轰然崩塌。民国肇建，创业殊艰；共和缔造，前路尚遥。本书所叙述的，正是从清室逊位、民国建立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中国决定正式参战为止的这段历史。这是一段风雨飘摇的多事之秋，其间波谲云诡、山重水覆，每每令后世读史者为之废书而叹。

本书作者署名帕特南·威尔，其实是辛博森的笔名。在中国近代史上，辛博森算得上是一位大名鼎鼎“洋鬼子”了。他1877年出生于中国宁波，父亲是宁波中国海关税务司辛盛之。辛博森早年在瑞士留学，除母语英语外，能流利运用法语、德语和汉语。回中国后进入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在赫德爵士手下任总司录司事，义和团期间亦曾被困使馆。1902年，辛博森辞去海关职位，投身新闻业，先后任过一些英国报纸驻北京的通讯员。辛亥革命后，任伦敦《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驻北京记者。1916年被黎元洪聘为总统府顾问，1922—1925年兼任张作霖的顾问。期间，他还创办了当时北京最大的英文报纸《远东时报》（*The Far Eastern Times*）。1930年，协助阎锡山接收海关，引起西方列强的强烈不满，9月阎锡山反蒋失败，遂将海关交出，11月遇刺身亡。辛普森是著名的中国通，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在中国度过，毕生关注远东问题。他以“帕特南·威尔”为笔名，出版过不少讨论远东问题的著作，除本书外，还有《远东的新调整》、《满人与俄国人》、《来自北京的有欠审慎的信函》、《东方的休战及其后果》、《中日两国真相》等书。

本书最早于1918年在伦敦出版，在西方引起广泛的关注。因



为此时作者依然是中华民国总统府顾问，书中所记述的这段历史，也正是作者在中国政坛和报界最活跃的几年，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在当年信息尚不透明的情况下，此书几乎就是一份内幕报告。

民国初建，百废待兴，在一个帝制的香火延续了两千余年的古老帝国，要建立现代议会民主制度，一切还得从头学起。当国者似乎也愿意摆出一副虚心学习姿态，于是，聘请洋顾问成了一时风气。莫理循之于袁世凯，辛博森之于黎元洪，皆一时之选。辛博森充任总统府顾问期间，看来也并非只是白拿薪水的花瓶，现存《黎元洪藏函电稿》中收有《辛博森外务报告》计30件，时间从1916年9月至1917年6月。不管这些报告对当时中国的外交政策有多大影响，这样的数量至少说明，辛博森对顾问这份闲差，还是颇能勤勉尽力的。

书中对黎元洪颇多溢美之词。以我辈这等小肚鸡肠度之，大约也是“拿人家手短，吃人家嘴软”吧。不过话说回来，黎元洪虽然素有“黎菩萨”的雅称，做事缺乏果敢，但考其生平，应该说大节还是无亏的：武昌首义，举国憬从；洪宪封王，数次严拒；张勋复辟，通电反对。这些，在那个风云变幻、泥沙俱下的时代，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知人论世，殊为不易，后世读史者，不可不察。

辛博森虽然号称中国通，但毕竟是洋鬼子，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到底有些隔膜。书中许多言之凿凿的预言，在我们这些事后诸葛亮看来，实在是太过乐观了。按照唐德刚教授的估计，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从1840年算起，大约需要200年，方能走出“历史三峡”，才能“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参见《晚清七十年》）。在本书所记述的那个时代，这段“历史三峡”，行程尚未及半，其后又有多少崎岖坎坷，多少艰难挫折。风高浪恶，一波数回，沉舟侧畔，关山万里。读史者披卷至此，能不扼腕唏嘘，抚案长叹。



目 录

第一章 门终于打开了 /1

过去6年的历史，将是一出情节缓慢的悲剧的历史，几乎每一页都写满了那个被推举为权力执行者的名字，此人，便是袁世凯。

第二章 袁世凯之谜 /19

毫无疑问，皇上是被毒死的。民间谣传，他在断气的时候，不但给了皇后一道密诏，要她处死袁世凯，而且还用他颤抖的手，在空中一个接一个画圆圈，直到身边的亲信明白了他的意思。

第三章 共和乱局 /34

这一卑劣行径所激起的轩然大波，使得在北京召开国会似乎毫无可能。但人们越来越普遍地感觉到：形势如此令人绝望，看来不得不采取行动了。

第四章 通往独裁之路 /51

这位独裁者的性格中潜藏的虚伪和软弱，在下面的事实中暴露无遗：他从不触动恶棍将军张勋的部队，此公已经捣乱多年。



目 录

第五章 险恶的邻居

/61

袁世凯立刻认识到：那个终其一生都如影随形的复仇女神，又一次逼近了自己的身后。在日本人进攻胶州湾的时候，他就预见到了那张就连他无与伦比的外交手段也无法解开的复杂大网。

第六章 日本的最后通牒

/75

日本人这次以最后通牒所赢得的胜利，所付出的代价也很惨重，其最终的损失，甚至要超过彻底的失败，因为中国人的猜疑和敌意如今更加根深蒂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将它们彻底清除。

第七章 暗中的勾当

/101

这份文件透露了一个令人惊悚的秘密：日本人在内心中对待他人的看法，这种看法，不仅针对敌人，而且也针对朋友。他们不信任任何人，不善待任何人。

第八章 杨度的小册子

/121

倘若袁世凯真正富有政治洞察力的话，那么毫无疑问，他就可以通过响应这样的民族呼声，从而不费力气地最终攀上其政治野心的至高点，并把烙在自己名字上的每一个黑色污点擦得干干净净。

第九章 古德诺博士的备忘录

/145

出版这样一份颠覆性的文件，这在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首都，恐怕都会导致暴动和骚乱。而在中国，这个和平之家，政治家和平民百姓都低头垂眉、静待时机。

目 录



目
录

第十章 梁启超横空出世

/159

在梁启超的军火库里，拥有各式各样的武器，可以用来反对袁世凯的篡位企图。他准确地知道从何处下手，用多大的力气。

第十一章 梦中的帝国

/177

袁世凯是个老滑头，他不会不知道形势正在急转直下，当然也不会不知道，如果事情办砸了，自己将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但家庭的影响和那帮阴谋家们的声音实在太大了，到最后，他不得不同意跨出更远的一步。

第十二章 云南起义

/191

倘若能给他两个星期优雅从容的时间，他或许就能展开一场最漂亮的现代化战役，因为他是一名卓越的军人。

第十三章 梦断黄梁

/201

在他断气前的几分钟，他声音沙哑地喃喃道：“我不想要这个结局，我不想当皇帝。是我身边的人想要一位皇上，硬要我登基称帝。我信了，结果被骗了。”

第十四章 新政权有什么变化

/215

袁世凯刚刚入土为安，总统府便颁布了一道命令，立即逮捕所有帝制阴谋的首犯。但这帮混蛋早就逃之夭夭，已经找到了安全的藏身之地。



目 录

录 目

第十五章 两个难以置信的案例 /232

我曾屡次三番讲过，他们要是胆量，就让他们来吧，公开把满洲占了去，但不要再搞这些三岁小孩的鬼把戏了。

第十六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 /247

正在中国各地做考察旅行的日本陆军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将军，在一个最佳的时刻到达了北京，如今正忙于通过受雇于中国政府的日本官员扯动每一根绳线，试图以这种方式让这次可耻阴谋的领袖们成为日本人的傀儡。

第十七章 最后的难题 /283

表面上，日本所追求的直接目标，只不过是成为东亚公认的代言人和官方代表，但实际上，它一直是在利用这一代理人的身份做掩护，而得寸进尺，去达到其他列强依照不同原则所追求的目标。



乱世袁世凯

第一章

门终于打开了

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那场革命，最终以1912年2月12日清王朝的退位而收场，人们为革命的大功告成而欢呼喝彩，然而其真实面目却大为不同。随着中华民国的宣告成立，在人们的想象里，专制统治的阴影似乎真的已经风飘云散。然而，传统却依然活着，它足以让实质上的帝制机器，把那些名义上的胜利者打得落花流水。

打从1644年满洲人从奄奄一息的大明王朝手中攫取了皇帝宝座以来，排满运动就由来已久。各种企图终结满清统治的密谋，从来就没有消停过，然而历史学家们在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总是装聋作哑。他们的沉默，一方面要归因于缺乏真实可靠的档案材料，另一方面，在一个谣言盛行的国



度，要想凿实最简单的真相，亦殊非易事。不过，毋庸置疑的是，大名鼎鼎的“哥老会”（一个总部设在偏远省份四川的秘密组织），其起源便可以追溯到明代的遗民。这些人，打从他们被赶出北京城的那天起，就一直在开展拼死一搏的游击战争。到最后，来日收复河山的希望彻底破灭，绝望中，他们开始使出下三滥的手段：暗杀，破坏，唯恐天下不乱。至少，我们明确地知道一件事情：19世纪初叶，一个秘密组织曾密谋在北京城的大街上刺杀嘉庆皇帝，这一事件，导致这位皇帝突然放弃了微服私访的习惯。这一习惯的始作俑者，乃是从前的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他们一直乐此不疲，这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人们对外族主子的个人忠诚。

打那以后，一个多世纪以来，就再也没有哪位皇上胆敢从紫禁城那凶险的高墙后面走出来了，除了每年像冬至祭天那样的简短仪式，以及两次“逃跑”：第一次是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的时候，朝廷惊慌失措地跑到热河行宫避难；第二次是在1900年，随着义和团泡沫的破灭，八国联军的不请自来，皇上一大家子被迫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远走西安。

这样的囚禁，其后果很快就显露出来了。满洲人的统治，曾经

在紫禁城那凶险的高墙后面，皇帝事实上也成了身不由己的人质。





以刀马弓箭蜚声四海，如今迅速地变得如此衰弱，以至于皇上们都成了纯粹的“甩手掌柜”，任由大臣摆布。因此，19世纪的历史，在逻辑上完全可以称为“递衰”的历史。不但洋鬼子明目张胆地擂响帝国的大门，强行要求进入，国内的谋反叛乱也是层出不穷，遍地开花。撇开那些小打小闹不说，这一时期有两场大规模的穆斯林叛乱，还有翻天覆地的太平天国运动也迅速崛起。据估算，其间惨遭涂炭的生灵，达1亿之众。泱泱帝国，被两败俱伤的內战弄得支离破碎，乖乖地向洋人拱手交出了许多基本特权，等到接受了所谓的“治外法权”，那条通向最终垮台的道路，也就终于铺平了。

在这样的局面之下，如何能让专制主义苟延残喘呢？答案是如此奇特，我们不得不在此坦率而详尽地直言以告。

简单的事实是：除了在紧接着每次外族征服之后的那段时期之外（比如13世纪的蒙古和17世纪的满洲），中国不但从未有过任何堪称专制主义的东西，而且，在城市及其周边地区，除了最轻微低效的税收和聊胜于无的治安维持，除了民间自发或他们要求官方提供的所谓“互保”，根本就不存在任何管治。任何人如果对这些陈述有所怀疑，那他肯定对某些事实一无所知。这些事实，乃





是中国族群体系的构成基础和最高形态，必须透过这个国家的乡村生活对之进行富有耐心的研究，方能给予恰当的评价。坦率地说，专制主义是一个从忽必烈时代流传下来神话。那时候，他是那么骄傲地建造了他的“汗八里”（也就是马可·波罗笔下的Cambaluc，北京城的前身），并在里面塞满自己的军队（他们像冬天的积雪一样消失得那么迅速）。从那时直到现在，一套精心设计的繁文缛节，一套精心设计的虚伪策略，给“圣旨”赋予了一种他们从未真正拥有过的最高权威。君权在19世纪的消解，使得那位依然生活在皇城之内的“圣上”成为一个传说。传说中，对他而言没有什么奇迹是不可能的，百姓和官员都对他诚惶诚恐、俯首帖耳。

实际上，皇帝这个职位，从来就只是一个政治宗教概念，为了群体的利益而转化为社会经济法令。这些法令，以一种被称为“上谕”的定期说教的形式颁布天下，它们是政府的例行仪式。其效用，与其说是强制命令，不如说是指导教育。根据设计，它们宣扬并承续了这样一种国家理论：皇帝，乃是国家的最高领袖，他恪守“盛世”的道德原则。这个盛世，乃是自孔孟以降，所有圣哲先贤都曾反复念叨过的2500年前的那个繁荣时期。那时候，人民安乐，国家强盛。

因此，皇帝的职位，乃是天上的，而非人间的，是劝诫，而非武力，是用诸日常生活中的最为有力的论据。令人惊奇（确切地说，是令洋人惊奇）的回答，是由伟大的康熙皇帝在18世纪耶稣会传教士和多明我会传教士之间展开的那场大论战中所作出的。这个回答，使得中国成为罗马天主教国家的希望彻底化为泡影，同时也遭到了罗马教皇的拒绝。皇帝的回答是：祖先崇拜的传统习惯，是政治的，而非宗教的，它绝对正确。君权之下的中国，政治，只是



一种通过反复灌输“对祖先的服从”而得以行使的国家控制系统。16世纪末叶，满洲人还只是偏居中国东北的小小侯国，为登上帝王宝座而拼命攻打中国的长城。从那时开始，他们就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既接纳达赖喇嘛，也接纳西藏和蒙古那些地位更低的宗教头领。这种努力最后证明了：拥有尊贵，不同于纯粹的拥有皇位，它需要给那种以尚武精神开创的统治以稳固性。除非以某种方式赋予这种统治以“道德”名目，否则，它就像蒙古人的统治一样，只需一次宫廷政变，就足以让它土崩瓦解。

即使是在进入北京城之后，满洲人也并不像历史学家所描述的那样，完全是靠军事上的征服。纵然加上他们的蒙古和汉人助手，满洲也是一个太小的少数民族，除了打败明朝的军队，他们无法做到更多，也不可能让中国的主要城市俯首帖耳。对于研究他们的管理方法的学者来说，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就是：当他们统

1860年以后，国门大开，进入中国的洋鬼子渐渐多了起来。甲午战后，洋务大兴，西学也渐渐显学，连皇上也请起了洋师傅。图为溥仪夫妇和他的洋老师。





治中国的时候，他们只能和汉人一起管理。这种有效的制度，一直是一种双重控制，它始于中央的军机处和六部，继而延伸到各省首府，然而在巨大的乡镇序列中却戛然而止。在那些地方，有史以来的自治状态依然故我，实际上并没有被触及。精心设计的科举制度，连同保留给成功士子的官方殊荣，也被满清王朝所采用。如此一来，不仅安抚了汉人社会，也供养了一大批这样的人：他们的利益与维护新主子的统治休戚相关。因此，一直以来就作为晋身之阶的文学，不仅成了一种统治工具，而且实际上也成了外族统治的辩护士。考虑到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再加上有一套精心设计的协议条款以保护他们的女眷不会被侵略者的后宫所征用，那么，在经历了明代末年那种使国家支离破碎的可怕混乱之后，大批的汉人都欢迎一个更稳固的政权，也就无足为怪了。

随着 1860 年北京城的陷落和《天津条约》的批准，洋人纷纷涌入中国。正是他们，对满清专制主义的错误观念在世界各地的风行居功阙伟。在这项工作中，那些满脑子欧洲专制主义传统的西方外交官，扮演了颇为重要的角色。他们赋予皇帝以某种权威，而这种权威，事实上他们从未真正拥有过，除非是为了某些仪式方面的目的。或许主要是因为朝廷远离人们的视线之外，因为它在对外交往中的极端傲慢，才将一种“至高无上”的概念传布四方，引起人们充满敬畏的联想。汉族的官员们很快就发现，要想在无法抵抗的高压之下保护自己，最简便易行的手段，就是躲在君主那冠冕堂皇的名头后面寻求庇护。他们尽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而且做得如此成功，以至于在 1900 年之前，欧洲人普遍相信：在中国，没有别的统治形式比君主专制更能深入人心。等到他们发现，所谓“圣旨”，只是在表面上享有专制君主的最高权威的时候，西方人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要把某些他们完全没能从中国文化消极方面



予以分析的东西，解释得最符合自己的冒险精神。说来也巧，虽然自从“皇权神圣、绝对正确”的理论被治外法权摧毁殆尽的那一刻起，中国政府就完全成了“无政府”。然而，由于遥不可及的距离所提供的伪装，使得那种将国家怀疑主义转化为统治的积极因素的神奇力量，勉强支撑着政府继续运行。

要想充分解释中国的“距离哲学”，以及它在历史上的深长意味，恐怕需要整本的专著来进行讨论。但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只需指出它的几个基本要点也就足够了。古老的中国人民在他们辽阔广袤的土地上虎踞龙盘，不屑于那种在他们看来完全超乎自然的力量游戏（亦即蒸汽机、电报、装甲战船以及诸如此类），他们的日常生活，不可能受到侵扰。他们我行我素，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在他们看来，穿越辽阔无际、无路可通的空间发动袭击，纯粹是劳命伤财，而等到他们成为别人瞄准的目标时，在军事力量上，他们也就成了纯粹的笑柄。而且，也正是由于他们如此不堪一击，从而为现实的妥协铺平了道路。他们擅长现代外科医生所采用的那种技艺：尽可能地让伤口自我愈合。他们相信：时间和自然的力量，最终能解决政治上的纷争。对于这样的纷争，西方国家总是遵照截然不同的原则大胆出击。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看，这些观点并不错。从北京城到长江流域（这是中国的心脏地带），有 800 英里，远远超过从巴黎到柏林的距离。从北京到广州是 1400 英里，道路崎岖难行。由长江溯流而上，到云南是 2000 英里，这段距离，比拿破仑曾经进行过的最远的行军还要远。当人们说到“边疆领土”（蒙古、西藏、突厥斯坦）的时候，英里数就不再是数以百计，而必须换成数以千计了，再加上地势险要，怕是连罗马那些心高气傲的将军们，也要为之气馁。

如今的中国人也接受了这样的观点：距离是最重要的事情，它



是政府的出发点，也是政府的目的地。发端于明代的总督制，被满洲人当作一种稳固可靠、妙不可言的统治法则继承了下来，到后来已臻于完善。在这一制度中，我们看到的是那种消除了巨大障碍的制度安排。每一种权力都由皇上委派，以完全而广泛的方式统治地方，无远弗届。每几个行省统一在一位总督的治下，每件事情（除了名称）都像联邦各州一样独立，对它们的要求也只是征税，而在其他方面则全然不管。因此，那根将各省同中央政府绑在一起的链条，归根到底还是财政，而且只是财政。这一制度在1911年崩溃，其原因，正是由于财政改革（他们低估了以蒸汽机为象征的新生力量）像军事改革一样，都实施得太迟了，而且方式也是错误的，因此，非但没有巩固反而极大削弱了君主的权威。

依据改革计划（在义和团底定、两宫回銮之后，这一计划颇受欢迎），总督确立了一项最要命的特权，就是控制所辖行省的钱包。他们大量从各省征税，然后转交给直接对北京户部负责的“财政专员”。这个部门一直在努力用欧洲那种直接征收每个便士（这将显示在“年度预算”中）的税收系统，来取代松散随意的“纳捐”系统。毫无疑问，假如时间允许，假如能得到欧洲的大力帮助，这项变革最终会大功告成。然而恰恰是因为时间不够，使得满清王朝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样的代价，总是因为那些办事拖沓之辈而不断地付出。古老的理论已经被公然抛弃，如今需要的只是这样的希望：国会将彻底摧毁“天子”的尊贵，让总督们在造反者的手里成为纯粹的人质。1911年革命发生后，短短的几周时间，就足以导致各省回到几百年前的状态，那时候，他们被彻底解放，各自为政。而且，他们一旦品尝到了这次新的独立所带来的喜悦，指望他们重新“北面称臣”，几无可能。

在这里，要想清楚地揭示中国地方主义的确切意义，则需要另